

总主编 ◎ 侣化强 苗文龙

宗教与法律经典文库



# 国家理性、政治宣传 与三十年战争

*Reason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美] 诺埃尔·马尔科姆◎著  
NOEL MALCOLM

邬 蕾◎译  
田飞龙◎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 侣化强 苗文龙

• 宗教与法律经典文库 •



# 国家理性、政治宣传 与三十年战争

*Reason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美] 诺埃尔·马尔科姆◎著  
NOEL MALCOLM

邬 蕾◎译

田飞龙◎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北京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三十年战争/(英)诺埃尔·马尔科姆著; 郭蕾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20-7804-3

I. ①国… II. ①诺… ②郭… III. ①政治体制—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7456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9(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 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三十年战争

---

## Reason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An Unknown Translation by Thomas Hobbes

by Noel Malcolm

Copyright © Noel Malcolm 2007

“REASON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AN UNKNOWN TRANSLATION BY THOMAS HOBBS,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三十年战争》一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 2007 年。本书中译本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5-4967 号

## 前言

本书呈现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部翻译手稿，该手稿来自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Habsburg）立场上的一本政治宣传手册。译稿文本获得重印，伴有若干解释性注释；原初的拉丁文本也同时给出，以便读者对霍布斯的译者实践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本书的六个导论性章节中，我不仅给出了将该匿名手稿识别为霍布斯译稿的理由，而且提出了我关于该译稿之背景、文本自身之属性及这一发现对于霍布斯研究之可能重要性的相关思考。在上述最后一点上，我努力地不过度强调自身贡献。小册子原本并非霍布斯所作，且很有可能翻译它的任务是由他的某个保护人简单强加给他的。尽管如此，霍布斯曾密切关注这一特定文本的事实本身对于研究他的思想传记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因为该译本出现于他的学术生涯早期，该时期关于他的传记材料所存甚少。这本小册子为霍布斯的某个保护人所重视的同时亦告诉了我们关于他所介入的圈子之政治利益所在；该话题也会在本书的某个导论性章节加以探讨。同时，小册子本身就是17世纪早期宣传文学的一个异常迷人的典范——反讽的、精巧的、饱含信息量的一部作品，即便没有与霍布斯的关联，也能够吸引致力于



三十年战争及该时期论战实践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因此，霍布斯的译本在本书中被大量注解，因为这些注解旨在满足大量不同的需求：除了标示出译本的错误与遗漏之外，这些注解不仅要识别出人物、地点和事件，而且也会表明（如有必要）这本小册子的系列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准确信息或因宣传目的而遭到扭曲。最后，由于霍布斯译本的最终数页散佚，我就将自己的翻译加进了他的版本。这样的话，读者就可以通盘考察整个作品的主张和论证——霍布斯自己也会这样做。当然霍布斯完整的翻译手稿也可能重见天日。如果克拉伦登版（the Clarendon Edition）的霍布斯著作（最终版本）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霍布斯在这个最后部分的文字也会包含在这个版本中。对我曾经未能做出阐释的有关要点的澄清（以及，或许还包括对我曾提出的有关解释的更正）亦会包含其中。不过，另外，克拉伦登版不会包含拉丁文原本；有关注解在那个版本里也会从简；而那个版本里的导论性材料也必然会比本书的六章节更为简略。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累积了诸多方面的人情债。在特定观点的帮助与建议上，我非常感激以下师友：吉姆·亚当斯（Jim Adams）、彼得·比尔（Peter Beal）、托马斯·科格斯韦尔（Thomas Cogswell）、鲍伯·埃文斯（Bob Evans）、阿拉斯代尔·汉密尔顿（Alastair Hamilton）、金奇·霍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蒂姆·雷勒（Tim Raylor）、保罗·西沃德（Paul Seaward）、凯文·夏普（Kevin Sharpe）、霍特索·斯潘宁卡（Hotso Spanninga）和玛尔塔·瓦库里洛娃（Marta Vaculínová）。我要特别感谢帕特里克·芬格拉斯（Patrick Finglass），他监督着我翻译文本最后数页并给出了颇有教益的修正与建议。同样要感谢安德

鲁·佩皮特 (Andrew Peppitt)，他在我访问查茨沃思 (Chatsworth) 期间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的职员，本书的诸多研究工作即在那里完成。我满怀感激地记录下了查茨沃思托管会和大英图书馆托管会的帮助，它们准许我复印收藏库中的手稿照片。我还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莫蒙特奇洛夫 (Peter Momtchiloff)，他对本书表现出特别兴趣并帮助通过了出版社的审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感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管理人员和同事，他们给了我从事精密研究的自由，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001 | 前 言                      |
| 001 | 第一章 霍布斯的早期生平             |
| 020 | 第二章 译本：作者、日期与风格          |
| 038 | 第三章 《绝密谕示》诸文本            |
| 077 | 第四章 《第二绝密谕示》在英格兰的传播      |
| 093 | 第五章 巴拉丁政治：卡文迪什、曼斯菲尔德和霍布斯 |
| 115 | 第六章 “国家理性”与霍布斯           |
| 156 | 《第二绝密谕示》霍布斯译本            |
| 218 | 手稿列表                     |



223 | 参考文献

248 | 索 引

266 | 译校后记

## 第一章

### 霍布斯的早期生平

在纽卡斯尔伯爵（Earl of Newcastle）一世威廉·卡文迪什<sup>1</sup>（William Cavendish）的某一卷文件中，有一个英文文本，其标题为《敬献弗里德里克五世的第二绝密谕示，为法国-英国-荷兰，由低地荷兰语译为拉丁文且为了最高公益而披露》（*A Second Most Secret Instruction Gallo-britanno-batauiam, Giuen to Fredericke the V. Translated Out of Low Dutch into Latine, and Diuulged for the Most Publique Good*）<sup>〔1〕</sup>。这是一份政治宣传册的译稿，是对巴拉丁选帝侯 [the Elector Palatine, 是德意志新教国王及詹姆斯一世的法定子嗣，其从反哈布斯堡（Habsburg）叛乱者手中接受波西米亚王位的行为将中部欧洲卷入战争] 之地理政治地位与利益的分析，原作 1626 年出版于欧洲大陆某地<sup>〔2〕</sup>。考虑到《第二绝密谕示》（*Altera Secretissima Instructio*）是

〔1〕 British Library [hereafter: BL], MS Add. 70499, fos. 73-83.

〔2〕 出版地点给出的是海牙 [Hague, “海牙议会” (Hagae Comititis)], 但这可能是有意虚构的。参见本书第三章注释 46。



号召推翻查理一世国王的一份精巧而恶毒的反哈布斯堡立场的宣传册，这份翻译手稿并未付印，在当时亦未曾慎重思虑过要出版。没有任何现存的证据表明任何人牵涉进了这部译稿的启动、制作或传播——如果它有所传播的话。译者姓名没有留在译稿上；尽管如此，存在诸多理由（下文将列出）认为这一英文译稿是出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手。

霍布斯应当从事了17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这一任务，这与其在那时的个人档案的诸多关键层面相一致：作为拉丁语学者的技能；作为翻译者的经验；在贵族家庭担任“秘书”的角色；以及与未来的纽卡斯尔伯爵有私交。为了描述霍布斯翻译这一拉丁文本的背景，提供其早期生涯中与此系列层面相关的细节或许是有帮助的。

霍布斯曾受教于一位牛津毕业生罗伯特·拉蒂默（Robert Latimer），后者被随后的一个门生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描述为“一名优秀的希腊学家”<sup>[3]</sup>。在其指导下，霍布斯应当接受了那样一种特定的人文教育，后者在英国都铎王朝晚期的语法学校里成了标准课程。这种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对拉丁文的掌握；事实上，在当时，熟习拉丁文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大学的入学条件之一<sup>[4]</sup>。这一技能不仅要通过语言学习来获得，而且要通过古典修辞研习[比如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以及沉浸于拉丁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的主要文本中加以掌握。<sup>[5]</sup>在学校教育的末期，通常（至少在好的学校）也要求知晓掌握一些希腊语。在

[3] J. Aubrey, “Brief Lives”, chiefly of Contemporaries, ed. A. Clark, 2 vols. (Oxford, 1898), i, pp. 328–9.

[4] M. Feingold, “The Humanities”, in N. Tyacke, ed.,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v: *Seventeenth-Century Oxford* (Oxford, 1997), pp. 211–357, here p. 243.

[5] 对此的权威论述，参见 Q. Skinner,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 1997), pp. 19–40.

拉蒂默的鼓励下，霍布斯在这里似乎达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语言熟练水平：在离开学校之前，他已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整篇《美狄亚》（*Medea*）译成拉丁诗篇。<sup>〔6〕</sup>

我们甚少知悉霍布斯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Hall, Oxford, 1603-1608）的学习情况，而在霍布斯的自传材料以及约翰·奥布里的笔记中呈现给我们的有限细节又被对霍布斯后期好辩性的关注严重扭曲。霍布斯展现给我们的图景是一份充斥着野蛮的学院化逻辑以及陈腐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大学课程表——他厌烦地转向他处，喜欢泡书店消磨时光，打量那些满载着最新的地理与天文发现的地图。<sup>〔7〕</sup>事实上，当时牛津的课程表是“人文教育的典范”；霍布斯的很多时间应当花在了拓宽与加深其修辞、诗歌、历史与道德哲学领域之经典文本知识上。<sup>〔8〕</sup>当威廉·特朗布尔（William Trumbull）的儿子1622年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特朗布尔建议他：“与诗人们对话，坚持一年，我就能让你熟习诗歌。为了你的拉丁语，勤勉阅读塔利（Tully）和李维（Livy）；读读普林耶斯（Plinyes）和曼努修斯（Manutius）的《书信集》（*Epistles*），加强你的希腊文……学会写作诗歌、戏剧和演讲词。”<sup>〔9〕</sup>17世纪初两名牛津大学生的账本显示，他们为了学习之需购买了以下作家的文本：贺拉斯（Horace）、尤维纳尔（Juvenal）、佩西乌斯（Persius）、马提亚尔（Martial）、鲁康（Lucan）、奥维德（Ovid）、普劳图斯（Plautus）、塞涅卡（Seneca）、

〔6〕 Aubrey, “*Brief Lives*”, i, pp. 328-9; T.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latine scripsit omnia*, ed. W. Molesworth, 5 vols. (London, 1839-45), i, p. xxiii.

〔7〕 Aubrey, “*Brief Lives*”, i, pp. 329-30;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i, pp. lxxxvi-lxxxvii.

〔8〕 Feingold, “The Humanities”, p. 213.

〔9〕 BL, MS Add. 72441, fo. 4r (24 August [1/3 September] 1622).



佩特罗尼乌斯 (Petronius)、德奥弗拉斯特 (Theophrastus)、奥卢斯·格里乌斯 (Aulus Gellius)、塔西佗 (Tacitus)、佛罗鲁斯 (Florus)、李维、萨鲁斯特 (Sallust) 和苏埃托尼乌斯 (Suetonius)。<sup>[10]</sup> 霍布斯的财务实力或许不足以允许他购买那么多书;但其阅读经历必然遵循了类似的课程方案。

霍布斯 1608 年毕业后不久就受雇于哈德威克 (Hardwick) 的卡文迪什男爵威廉姆·卡文迪什,担任其长子的家庭教师,后者只比霍布斯小两岁。他是经莫德林学院院长私人推荐担任该职位的,这表明他被视为一名优秀学生。这位长子也叫威廉·卡文迪什 [1609 年成为威廉爵士,在其父亲 1618 年擢升为德文郡伯爵 (Earldom of Devonshire) 后成为卡文迪什勋爵],在经过数名家庭教师培养后已比较精通拉丁文。<sup>[11]</sup> 他起初有着严肃的智识兴趣,很快就变得稀松平常了,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他是一个头脑好使的人,一个浪荡子 (至少在其青少年时期),一个挥霍无度的人。<sup>[12]</sup> 霍布斯既享受着“与他一起狩猎”的快乐,也担负着以他名义四处借债的屈辱。<sup>[13]</sup> 尽管如此,某些讲学活动似乎也确实发生了。卡文迪什男爵的账本列出了似乎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购书情况:《阿米亚诺·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 (1609);凯克曼 (Keckermann) 的《物理体系》(Systema Physica) 和《政治》(Politica);

[10] Feingold, "The Humanities", p. 250.

[11] Chatsworth, MS Hardwick 143/12 是起草于 1602 年 11 月 16 [26] 日的一份文件,其中达成协议称:“如果威廉先生在卡文迪什家族若干成员面前能够讲出拉丁文”,“那么我的主人就将给予威廉先生一柄利剑、一束绣花腰带和挂钩以及一对马刺”;该文件由卡文迪什男爵及其子共同签署。

[12] 这位公子哥早期教育、浪荡及债务的细节见于英国议会托管会涉及他在 1602—1629 年期间未公开出版的文章中 (作者: V. C. D. Moseley);我非常感谢议会托管会允许我查看该文稿。

[13] Aubrey, "Brief Lives", i, pp. 331, 347.

普鲁塔克 (Plutarch) 的《名人传》(*Lives*, 1611) 以及普鲁塔克的另一卷书; 拉穆斯 (Ramus) 的《语法》(*Grammar*) 以及《西塞罗美文选》(*Elegantiae Ciceronis*, 1613)。<sup>[14]</sup>同一来源还提供了他学习意大利语和法语的证据: 博泰罗 (*Botero*) 的《普里马韦拉》(*Primavera*) 和《事实记忆》(*Deti e Fatti Memorabili*); 《友爱政治》(*Tesoro Politico*) 节选; 一部《法语词典》(*French Dictionary*) 和一部《意大利语词典》(*Italian Dictionary*, 1611); 《考德瑞斯: 拉丁语和法语》[*Corderius in Latin and Frenche*, 马蒂兰·科迪埃 (*Mathurin Cordier*) 的畅销教学对话双语版]; 《精神测试》[*Examen des Esprits*, 瓦尔特 (*Huarte*) 《精神测试》的法语译本, 1612]; 《法语和拉丁语词典》(*French and Latine Dictionary*)、《法语新约》(*New Testament in French*); 《法语赞美诗》(*Psalmes in French*) 以及《山川散文》(*Monntains Essaies*, 1613)。<sup>[15]</sup>或许就是在这一阶段的意大利语学习准备中, 霍布斯的这个学生将卡斯蒂廖内 (*Castiglione*) 的第一本书《廷臣手册》(*Libro del Cortegiano*) 译成了拉丁文。<sup>[16]</sup>语言学习在这个贵族家庭内显然是被认真对待的;

[14] Chatsworth, MS Hardwick 29, pp. 143, 219b, 263b, 355. 可能霍布斯也同时给两个幼子做了讲授。

[15] Chatsworth, MS Hardwick 29, pp. 219b, 263b, 303, 316, 355.

[16] Chatsworth, MS Hardwick 64: 译者姓名首字母“W. C.”作为鎏金大字印在了译稿封面上, 整个手稿是用书法体写成的, 十分类似文件 MS Hardwick 143/12 (前引注 11) 上未来伯爵二世的签名体。拉丁译文上有某些修改, 其中一些可能出自霍布斯之手。哈德威克图书馆目录 (MS Hobbes E. 1. A.) 包括了一个条目《廷臣》(卡斯蒂廖内, 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版本)——指的是 1588 年伦敦版, 以并排形式刊印出了意大利语文本以及加布里埃尔·查珀斯 (*Gabriel Chappuys*) 和托马斯·霍比爵士 (*Sir Thomas Hoby*) 的各自译本。这一版本译为拉丁文是一种有益的教学训练, 同时涉及对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学习。同一目录还包括了一个关于巴塞洛缪·克拉克 (*Bartholomew Clerke*) 的拉丁版本 (London, 1571 及其后的若干版本); 不过, 或许这只是后来才获得并编入的。



账本记录了“法国人刘易斯”的家教服务，后者大概是一名语言教师，在1614年5月领过酬金。<sup>[17]</sup>

不久，霍布斯与其学生一道投入了一个大型的出游计划，从1614年6月一直持续到1615年10月。<sup>[18]</sup>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威尼斯；1614年10月，他们从那里开展了一次前往罗马的探险，然后返回威尼斯并一直待到1615年夏季。卡文迪什努力学习意大利语，并作为一种训练而将培根（Bacon）的《论说集》（*Essayes*）译为意大利语版本（该版本随后于1618年在伦敦出版，尽管没有直接归于卡文迪什）。<sup>[19]</sup>他同时见到了威尼斯的学界领袖保罗·萨皮（Paolo Sarpi）并熟悉了萨皮的密友富尔吉佐·米加佐（Fulgenzio Micanzio）。在卡文迪什（和霍布斯）离开威尼斯后，米加佐开始给卡文迪什写一系列的长篇信件，一直持续到卡文迪什去世。那些信件由霍布斯译为英文保存下来。由于卡文迪什完全可以阅读意大利语原件，很显然译文是为了供他人传阅之用；有证据显示那些信件经历了两种传阅形式，一种是以单独信件形式传阅，另一种是以完整的信件合集形式传阅。<sup>[20]</sup>书信原件已不复存

[17] Chatsworth, MS Hardwick 29, p. 370.

[18] Ibid., pp. 371, 453.

[19] See N. Malcolm, *De Dominis (1560-1624): Venetian, Anglican, Ecumenist and Relapsed Heretic* (London, 1984), pp. 47-54.

[20] 两份文章的信件抄件保存了下来：Chatsworth, Hobbes MSS, 未编号的《意大利语信件译稿》；BL, MS Add. 11309。前者保留有霍布斯的某些注释。有个版本（基于大英图书馆版本）已出版，即 F. Micanzio, *Lettere a William Cavendish*, ed. R. Ferrini and E. De Mas (Rome, 1987)：逐渐传阅的证据参见第13、155页。还可参见 V. Gabrieli, “Bacone, la riforma e Roma nella versione Hobbesiana d'un carteggio di Fulgenzio Micanzio”, *The English Miscellany*, 8 (1957), pp. 195-250。菲利波·德·维沃（Filippo de Vivo）认为米加佐的书信是米加佐和萨皮共同写的，依据是某些相同材料也出现在萨皮自己的书信中 [“Paolo Sarpi and the Uses of Infor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Venice”, in J. Raymond, ed., *News Networks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2006), pp. 35-49, here p. 37]。这一观点可以有两种理解：大忙人萨皮的通信也可

在；尽管如此，霍布斯译稿给人的印象是，他本人一定很好地掌握了意大利语。在其散文体自传中，霍布斯声称其在逗留法国和意大利期间所学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刚好“能够适当地理解它们”，这显得有些过谦了。<sup>[21]</sup>

不过，对霍布斯而言，似乎他对这些现代语言的知识看得不如其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掌握更重要，后者他曾费了很大气力才保持住。在其散文体自传中，他声称在受雇后的第一年里曾担心遗忘掉那些古典语言；为了补救这一点，奥布里后来详述到，他“给自己买了阿姆斯特丹版本的可袖珍携带的有关书籍（主要是凯撒的评论），以便他在其主人出访时可以在休息室或前厅读上一读”。<sup>[22]</sup>从此次大型出游归来后，霍布斯开展了一项阅读古代诗人与历史学家（包括针对前者的评论家）作品的计划，“旨在能够以一种典雅的拉丁文而不是辞藻华丽的风格来写作”；他研习的文本包括贺拉斯、维吉尔（Vergil）、普劳图斯（Plautus）以及大量的希腊作家，包括荷马（Homer）、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诸多历史学家”，其中“我最喜欢修昔底德（Thucydides）”。<sup>[23]</sup>在其学生年满25周岁返回英格兰后，霍布斯的角色就不再是单纯的家庭教师；他如今被正式确认为卡文迪什的“秘书”（secretary）。<sup>[24]</sup>关于其秘书职责到底牵涉何事，只留存下零星的片段证据。1617—1618

能部分地由米加佐来操持。不过，考虑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某种合作在该场合下也是可以合理推定的。

[21]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i, p. xiii: “ut intelligere eas mediocriter potuerit”.

[22] Ibid., p. xiii; Aubrey, “*Brief Lives*”, i, p. 331.

[23]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i, pp. xiv (“non ut floride, sed ut Latine posset scribere”), lxxxviii (“multi Scriptores Historiarum”; “prae reliquis Thucydides placuit”).

[24] See Skinner, *Reason and Rhetoric*, p. 222.



年间，除了继续翻译米加佐书信之外，霍布斯还可能在帮助卡文迪什准备其培根《论说集》的最终译稿；该项工作或许建立了霍布斯与培根的联系，后者（至迟）于1616年和卡文迪什熟识并被认为对译稿早期版本进行过校正。<sup>[25]</sup>对培根作品的推崇也经由卡文迪什本人撰写的十篇系列“论文”而表现出来；这些论文的校订本（fair-copy）由霍布斯誊出，可能是于1619年元旦呈送给了卡文迪什的父亲德文郡伯爵。<sup>[26]</sup>在其对该书的献辞中，卡文迪什为自己使用英语而不是拉丁文写作进行了辩护：“对任何人而言，使自身学会而不是理解拉丁文似乎已为成见，不过理解好拉丁文——尽管不实际去说——就是使它尽量地有用。”<sup>[27]</sup>卡文迪什自身确实“理解好拉丁文”了，这在下一年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他的十篇论文与四篇长“专论”（discourses，其中一篇已在九

[25] Micanzio, *Lettere*, pp. 54–5 [1616年3月31日：“我异常依赖您而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来往，我十分钦佩他的判断与学识”；“让我与他保持通信是件快事，我……视之为巨大的快乐并欠下对您的人情债”]；Malcolm, *De Dominis*, pp. 50–2. 培根与卡文迪什的友谊在培根遗嘱的两个版本（1621/1625）中被证实，参见 F. Bacon, *The Works*, ed. J. Spedding, R. L. Ellis, and D. D. Heath, 14 vols. (London, 1857–74), xiv, pp. 228, 542；也可比较 G. C. Roberson, *Hobbes* (Edinburgh, 1886), p. 19 (n.). 培根的牧师和文书印制了米加佐致卡文迪什某封信的节选稿，参见 W. Rawley, “The Life of the Honourable Author”, in F. Bacon, *Resuscitatio*, ed. W. Rawley (London, 1657), sigs. b2–c4, here sig. c3r, 其中引述了霍布斯翻译的米加佐1622年5月6日书信中的一段：Micanzio, *Lettere*, p. 167, 这表明霍布斯在培根文稿中发现了这封信，也同时表明培根是霍布斯之米加佐书信译稿的受众之一。还值得指出的是，查茨沃思（Chatsworth）的哈德威克手稿中现存有四卷本的培根著作，参见 F. Bac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c. 1611–c. 1619, The Oxford Francis Bacon, vi, ed. G. Rees (Oxford, 1996), pp. cvi–cx.

[26] Chatsworth, MS Hardwick 29, p. 575, entry for 1 [7/11] January 1619：“致霍布斯先生：从主人处取回了一部书稿”。包含有一篇致伯爵的献辞的校订本是 Chatsworth, MS Hobbes D 3；该文本刊于 F. O. Wolf, *Die neue Wissenschaft des Thomas Hobbes: zu den Grundlage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Stuttgart, 1969), pp. 135–67. 那篇献辞将卡文迪什之书称为“这个时代的礼物”（第136页）。

[27] Wolf, *Die neue Wissenschaft*, pp. 135–6.